

以天地为课堂

过年的时候，一个很久之前的学生来看我，闲聊中问我，是否记得有一回上课时，天空渐渐飘起雪花，同学们无心听讲，都朝窗外看去。我便带他们走出教室，在漫天大雪中散步、赏雪。我有点印象，应该还让他们写了随笔。

那一节课，学生们像池塘里的鱼儿一样，穿梭在教学楼、操场和雪花之间。他们抬头看天空中、树枝上飘下的雪花，他们伸手接住雪的绒花，他们感受着雪花在手上渐渐湿润、消失，继而一丝丝的清凉。“我一想到您，就会想到那场大雪，想起雪花落在手上那种微小的清凉的感觉。”学生说。或许，对他而言，三年的语文课浓缩成一场大雪，落在记忆的校园，落在楠楼、柏楼之间。哦，对了，那时候，这些教学楼还叫作南楼、北楼。

校园确有它单调的一面，从早到晚，无非是像中药房的抽屉一样：有的抽出来是语文，有的是数学，也有音乐、体育……周而复始，始而复终。但一场大雪似乎改变了这一切，就好像一首练习上百次的钢琴曲有了难得的间歇，或是，一幅复制了上百张的图片突然有了裂痕。这难得的间歇和裂痕，通向一个和平常校园不一样的世界。

这个和校园不同的世界，就是天地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“不言”不是沉默无语，而是超越语言，用心体会。把课堂从教室搬到天地之间，学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体验。

2024年的春天，我正好在龙山校区工作，这个校园就在田野之中。到了春天，油菜花开，透过围栏望去，到处都是黄灿灿的，像是成吨的黄色颜料泼洒过，又像是有一个中国的梵高，用自己的笔画出了这个世界的热烈。而天空和远山都是蓝色的，但又有着不同，天空蓝得透明，而远山则带着一丝淡淡的雾气。

让孩子们到田野里去吧！我们几个老师说。

于是，语文老师带着学生到黄灿灿的田野中，一路吟着诗词，“儿童急走追黄蝶，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生物老师把实验器材带到田野，教学生解剖花瓣和叶片。美术老师在油菜花地里支起画架，和学生一起速写在田野的风中摇曳的花朵。我和他们一起来到油菜花丛中，享受雨后灿烂的小黄花，走过雨后泥泞的小路。我们的衣服上染了黄色的花粉，鞋上、裤脚上沾满了泥水，但大家毫不在意，说：“这里真是广阔！”

我把学生上课的照片、黄花灿烂的照片、裤脚沾满泥水的照片发到朋友圈，一位外地老师留言：“这就是帕夫雷什中学啊！”帕夫雷什中学是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办的学校，苏氏是苏联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，他通过非凡的教育实践将这所农村中学变成教育圣地。我们哪能和这所学校相比，和苏霍姆林斯基相比呢！但是，我们也有自己的收获，如果用一词概括，那就是“广阔”。这既是空间的广阔，也是心灵的广阔，更是精神的广阔。

人和植物一样，越是有广阔的空间，就越是能茁壮生长；越是和自然相连，就越能够成为天地的一部分。作为教育者，我们培养的是学生，而不是考生，应该努力让孩子们成为精神辽阔、与自然相通的人。

那位老师其实也经常带学生去野外、去乡村、去工厂，我们都受了传统的全面发展的教育的影响。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都有点愚公移山的“笨”精神。“笨”，恰恰是教育所需要的。

那年春天，我们还举办过一次“油菜花杯”语文创作比赛，让学生写一篇和漫山遍野的油菜花气息相通的文章。收上来的学生作品也的确和油菜花一样灿烂，一样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。有的整整一段只有逗号，情感没有阻碍地奔涌——

“我的眼睛炸开的是灿烂的金黄，伫立在原地久久难以走开，眯眼望去，眼前是明黄色的细密星河，每一小片都薄如蝉翼，却从不耷拉下头颅，团团聚在一起，几乎看不见深绿的茎叶，灿烂的明黄野性张扬，如此自由，如此坦荡，碎而密的花朵粲然，以一种极为用力的姿态，不加掩饰地去灿烂，不加掩饰地去美好。”

写得太好了！就好像他创造了一门可以和油菜花对话的语言。



舒兴庆，中学教师，诗人，在《中国德育》《诗江南》《安庆日报》等发表论文、诗文近百篇，部分收入全国语文教育、诗歌、随笔年度选本。曾获安徽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、中华书局伯鸿书香奖。

◇信笔扬尘

炊烟记

常鑫

晨光初透时，总见村口老槐树上栖着的麻雀扑棱棱飞起。它们不是被脚步声惊动，而是被一缕斜斜的青烟撩拨了翅膀。在江淮官话里，“做饭”不唤作“做饭”，而是“烧锅”，袅袅炊烟便成了锅腔烟。烧锅这两个字从农妇的唇齿间吐出，带着柴火气与草木香，恍若看见灶膛里跃动的火苗，听见铁锅与锅铲的私语。

炊烟是乡村的胎记。春耕时节，炊烟总比鸡鸣更早醒来。天空墨色未褪，村东头王二娘的灶膛已然起火，麦秸在灶膛里噼啪作响，腾起的烟柱笔直如尺，穿过结着薄霜的楝树枝丫，在青灰天幕上画出第一道墨痕。待到日头爬过东岭，各家炊烟次第升起，或浓或淡的青纱在村子上空交织，恍如神女浣纱时不小心遗落的轻纱。

夏日正午的炊烟最是慵懒。老榆树荫里，蝉鸣与炊烟一同蒸腾。此时烧锅的多是半大孩子，他们蹲在灶前添柴，看火光在脸上投下跳动的橘影。柴火是前日从田埂捡来的枯枝，带着太阳晒透的暖香。炊烟从烟囱口逸出时总拖着长长的尾，像极了祖母纳鞋底时抽出的棉线，悠悠荡荡飘过晒得发烫的瓦檐，最终消散在滚烫的风里。

最终消散在滚烫的风里。

最动人是秋暮的炊烟。稻谷归仓后，农人总爱用新收的稻糠引火。细碎的糠壳在灶膛里燃成金红的星子，腾起的烟里裹着阳光烘烤过的芬芳。这时站在村口望，但见炊烟或浓或淡，或直或曲，如同谁家顽童打翻了墨砚，在杏黄的天幕上淌出深浅不一的水墨。有风掠过时，烟痕便被揉碎成絮状的云，与归巢的鸟群纠缠着，渐渐没入暮色深处。

炊烟曾是乡间最精准的时辰钟。老辈人说：“锅腔烟起三遍，日头偏西一竿。”这话在霜降后格外灵验。当炊烟第三次爬上村口的老槐树梢，放牛娃便知该牵着水牛往回走了。牛蹄踩碎满地银杏叶，惊起几片偷食的麻雀，它们扑棱着飞向正在生火做饭的人家——那里有散落的谷粒，更有灶膛里温暖的召唤。

皖南民居讲究“炊烟引路”，屋舍布局总要顺着烟道走向。徽州建房，必在正厅留出“烟道窗”，说是要让炊烟认得回家的路。这说法虽带三分痴意，却藏着先民的智慧：烟道笔直，火才旺；火旺，炊烟才得升腾。就像人生在世，总要心气通透，方能活得敞亮。



千舟织浪
周文静
摄

◇山河故人

妈妈的五月

黄永生

十八岁那年，妈妈梳着一根乌黑的辮子，水灵得像窗前刚刚含露绽放的栀子花。这年妈妈竟主动申请要去支援边疆，妈妈可是连县城也没出过呀，外婆哭着劝妈妈：伢子，边疆苦呀，你力气小，一个人在那么远的地方怎么生活啊？妈妈没理会外婆，铁了心要离开家。

妈妈不是不听话，妈妈看外公外婆一把年纪了，还在为全家人的生活苦苦做工，心里舍不得，她想着去了边疆，好歹能为外公外婆减轻点儿负担。

妈妈虽一腔热血，终究还是没能去成边疆。妈妈在学校学的是地质勘探，组织要求她

到安庆地质队报到，服务于家乡建设。接到命令，妈妈二话没说，打起背包就一头扎起了大山深处。

妈妈与爸爸结婚后，生了我们姐弟三人。爸爸在野外搞勘探，单位外派一走便是七年，数千个日夜，妈妈独自挺了过来。早晨出门前，妈妈将一天的饭菜做好，让姐姐带我们在院里的栀子花下玩耍，饿了去煤炉子上热饭吃。天黑了，妈妈一路小跑回来了，摸摸我们的头，弯腰收拾被我们弄得乱七八糟的房间，又就着月光浆洗一家人的衣裳鞋子，妈妈长得瘦弱，却似乎有使不完的劲。

◇人间小景

第一次出国

占新民

如今，出国旅游、留学和工作，办理护照极其方便。只需去出入境管理局，填写护照申请表，提交一张证件照片和几十元的工本费，等上个把星期，护照就到手了。然而，在1990年代，办理一本护照、迈出国门却是困难重重，尤其是像我们这种自费出国留学或工作的普通人。

那时，从大学毕业后若要出国，首先要向所在系提交一份毕业去向表，明确表示不参加国家统一分配，而是选择出国留学。系里审批盖章后，才可进入下一步。第二步是将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或国外单位的聘用函，送到学校指定的翻译中心进行正式翻译。第三步则是凭翻译件前往学校缴纳“培养费”。之后，还需拿着缴费证明和派出所出具的户口注销证明，前往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护照。

“培养费”是按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限计算的：本科学历每年2500元，硕士每年5000元。如果本科毕业直接出国攻读硕士，四年本科就是1万元；如果硕士毕业后出国读博，则在本科的基础上加上硕士3年，共需缴纳约25000元左右的培养费。而那个年代，普通工薪阶层

的收入极低，1995年全国职工年均工资才5500元。如此高额的培养费，对于普通家庭尤其是农村出身的学生而言，是一笔非常大的数字。朋友海涛班上有位同学在硕士毕业后准备出国，因一时交不起培养费，差点被挡在国门之外。关键时刻，海涛慷慨解囊，帮他垫付了一部分，才使这位同学最终顺利出国留学。

我渴望在博士毕业后出国进修一段时间，接触国外先进的科研设备和理念。我们实验室的黄霞教授帮我联系了一个难得的机会——前往日本东京工业大学，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(UNESCO)项目的研究人员，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。

得知录取消息的那一刻我欣喜若狂，但随之而来的“培养费”却让人忧心忡忡。我在国内完成了五年本科学习、四年博士培养，总共需缴纳32500元。而我博士期间的助教工资每月只有380元，年收入不到5000元，刚够日常生活开销，根本无力承担如此高昂的费用。我一边把日本方面的录取通知书送去翻译中心翻译，一边暗自筹划：这笔钱向谁借？农村父母那儿难于启齿，只能四处向朋友张口。若实在凑不齐，

古人早将炊烟写入诗行。陶潜“暧暧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”是淡墨写意，杜子美“暧暧归烟暮，声声宿鸟频”乃工笔细描。最妙是范成大“炊烟漠漠衡门寂，寒日曛曛霁景分”，十字道尽冬日村居的静谧。这些诗句穿越千年，至今仍在某处炊烟里沉浮，如同被风干的桂花，遇水即活。

今人写炊烟，总爱缀以“乡愁”二字。可真正的炊烟从不是愁绪的载体，它是生命的呼吸。你看那灶膛里的火，烧的是枯枝败叶，吐出的却是滋养生命的暖；你看那烟囱中的烟，消散于天际，却将草木的灵魂送还云朵。就像村东头的周阿婆，八十高龄仍要每日生火，她说：“灶膛不灭，家就还在。”

前年回乡，见村口立起“天然气入户工程”的牌子。新修的柏油路旁，几株老槐树被拦腰锯断，断口处渗出琥珀色的树脂，像极了炊烟凝成的泪。夜里忽闻雨声淅沥，起身推窗，却见远处镇上灯火通明，哪还有半缕炊烟的影子？倒是窗台上，不知谁家飘来的桂花香，混着雨水的清冽，恍惚间竟嗅出儿时灶膛里的气息。

炊烟终将成为历史的注脚，如同那些正在消逝的方言词汇。但每当暮色四合，我总会在城市的天际线里寻找——寻找那缕能将人心引向灶膛的青烟，寻找那份能让时光慢下来的暖意。或许真正的永恒，不在于烟柱是否升腾，而在于我们是否还记得：炊烟起处，即是人间。

记得有一年深冬，大雪飘零，缸里的水都结了冰，爸爸按单位要求去乡下与贫下中农共度佳节了，天快黑时，忙了一天的妈妈牵着我们姐弟三人，踩着霜雪去买年货，可街上空空荡荡，所有的商店都打烊了。妈妈很是惊诧，好不容易找了个人打听，原来忙碌让她记错了日子，那天已经是年三十了。这时远处已渐渐响起鞭炮声，妈妈懊恼得泪流满面，妈妈站在风雪中，搂过我们亲了又亲，一边责备自己不是个好妈妈，竟然把过年都忘了。这时妈妈的好人缘就派上用场了，回家后，邻居、同事闻讯而来，你送一碗红烧肉，我送一碟豆腐，我们吃上了意义特殊的一顿年夜饭。

妈妈最爱栀子花，每到一地，窗前都会种上几棵。妈妈说她最爱栀子花的洁白、芳香，妈妈的身上，也散发着那缕芳香。

二十年前，妈妈走在栀子花开的五月，可那缕香，一直萦绕在我身畔。

只能忍痛放弃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了。

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命运悄然伸出了援手。

一天，传达室的胡师傅走进实验室叫我，说有人打电话找我。我接起电话，那头传来一位女声，亲切温和。她确认了我的姓名后告诉我，她是日语系的老师，正在为我翻译东京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她轻声说：“你不用担心，我会把通知书中的‘UNESCO研究员’翻译成‘UNESCO博士后’。”语毕便挂断了电话。

我愣在原地，随即心潮澎湃。因为按照当时的政策，若以“博士后”身份出国，则可免缴培养费。两天后，我收到了翻译件，果然如她所说，“UNESCO研究员”变成了“UNESCO博士后研究员”。这一微妙却关键的变化，使我成功获得护照，顺利前往日本。那一年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点，如果当时这位老师机械地照搬原文，也许我将与这次出国机会失之交臂，人生的轨迹或许彻底改写。

三十年过去，祖国更加开放，国力显著提升，老百姓的钱包也是鼓鼓的。如今出国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件该走就走的旅行。出国读研究生和工作可以随便办理护照，培养费也成为了历史名词，因为从2002年11月起，国家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的培养费政策。我26岁才第一次出国，而那时在国外华人圈中，我已算是最年轻的。如今的出国年龄越来越低，不说中学生到国外读初中高中，就是小学生去海外游学也屡见不鲜。

◇小说世情

刘子强又骂人了。这是一周以来的第三次，是在美术课堂上，先骂同学，后骂上前处理他的老师。班主任李老师说很生气，将刘子强带到办公室，往墙角一推：“站好！”

李老师说无法不生气。六年来，他一直认为，班上的学生都可以变坏，唯独刘子强不会。可偏偏就是他，眼看就小学毕业，却变坏了，而且毫无征兆。

刘子强第一次变坏是在本周一。他利用班上六一联欢会负责人的身份，打击、嘲讽同学们：报唱歌的，他说人家是公鸭嗓子；报舞蹈的，他说人家像企鹅。李老师将他叫进办公室，态度很温和，问他为什么骂人。

“就是骂骂人！”刘子强气冲冲一句后，任凭李老师怎么问，就是不说话。

李老师没有深究下去，他一直认为，学生偶尔出问题，老师不必大惊小怪。于是摸着他的头，激励他用心组织好这最后一次六一联欢会，将来给同学们留下美好的回忆。

可谁知星期三午休时，刘子强又无故辱骂一名同学，其他同学上前劝他，他逮谁骂谁。李老师有些不快，但态度还是很温和：“刘子强，你知道，我们马上就举行这最后一场六一联欢会了，联欢会一结束，就意味着我们小学毕业。你呀，千万要珍惜这宝贵的小学时光和同学友谊。”刘子强却像上次一样，死活不开口，连点头、摇头也没有。

中午，李老师来到刘子强家。刘家的房子在村子最高处，上下两层，装修得很气派。李老师拍打好一会儿门，刘子强的奶奶才模摸索索地打开门，问李老师是谁。李老师对着她的耳朵大声说了好几遍，她才听明白，然后一个劲地感谢李老师把她的孙子教得好，教得懂事。说她孙子在家除了看书写作业，就是做家务；她经常生病，都是孙子烧饭洗衣，买药喂药……李老师无法和老奶奶进一步交流，告辞。

今天是星期四，李老师还在犹豫着要不要给刘子强的父亲打电话，不料他竟然连老师也骂了。李老师狠狠拍了桌子：“说！为什么？”刘子强笔直地站在墙角，不开口，表情似乎还很得意。

“这才几天，你怎么就变成这样？”李老师戳着自己的额头，很无奈，“你对得起同学们吗？对得起老师吗？对得起你奶奶吗？对得起你一年到头拼搏在外的父母吗？”刘子强忽然眼圈一红，嘴唇动了动，又急忙紧闭。

李老师轻叹一声：“刘子强，你自己说吧，这怎么办？要不要……”

“要！要请家长！”刘子强抢声说。“什么？你希望请家长？”李老师完全没想到，再调皮的学生都怕老师请家长，可刘子强竟然主动提出请家长。李老师忽然有些绝望：“请你奶奶？你七十多岁的奶奶？还是请你父母？千里之外的父母？”

“随你！”

李老师一般不会请学生家长，尤其这些远在外地打工的家长，因为他们来回一趟的路费、误工费都不是小数，有的甚至还会丢掉工作。可眼下这刘子强——李老师虽然觉得其中有什么蹊跷，但一时又实在理不清，如果再不请家长就是对他不负责任。

第二天下午，刘子强父母长途驱车来到学校。李老师将刘子强的情况向他们详细通报后，从教室叫来刘子强。

刘子强一进办公室，他母亲就一把搂住他，哭了：“我的好儿子，你怎么了？前几天给你打视频，你还好好的，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这样？”刘子强胳膊肘一扭，闪开，冷冷的，看也不看母亲一眼。

刘子强父亲站到儿子的对面，用手比画着两人的身高：“儿子，爸妈一年没看见你了。你看，你都快和爸爸一样高了。你到底怎么啦？”

“老师，我错了！老师，我欺骗了您”！刘子强站到李老师面前，恭恭敬敬地一鞠躬，眼泪滚滚，“老师，我两年没见到爸爸妈妈了，我想他们。今年过年前，他们说过年回来，可后来说有事回不来，六一一定回来。可是，上周末又说六一也回不来了。老师，我们上初中后就不过六一了，这是我的最后一个六一，我想和爸爸妈妈一起过……”

刘子强还在“对不起老师，对不起同学”地诉说着，他的父母、李老师，以及办公室里的老师们，早已低头不语，有的还在低声抽泣。

